

文化主体的适应与嬗变^{〔*〕}

——基于费孝通文化观的一些深度思考

○ 赵旭东¹, 张 洁²

(1. 中国人民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2;

2.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强化了人们的文化自觉的能力,强调了文化如何保持主体性的问题。在费孝通的文化观念中,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探讨,折射出他对于当文化在面临社会转型和新旧交替之时,文化主体如何从自主适应到自主回归的一种认识。在其不同人生时期的文化观论述中可分析出,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是什么、变迁特点、如何保持等问题始终给予关注。基于此,文化主体呈现出适应与嬗变的新特点(历史适应性、循环性、世界性、心性),具有上述四大特点的“文化主体”可称为“复合循环文化主体”,是在时间和他者的不断互构、共生碰撞的文化动力学过程中滋长起来的。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历史适应性;循环性;世界性;心性;复合循环文化主体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12.015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概念,以此应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反应。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化自觉”是对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发展趋势有了解和认知,通过对“己文化”的“自觉”和“认知”进而提升文化自主意识和文化适应能力。费孝通在其文化观念和学术思想中渗透了关于“文化主体性”的回归、文化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文化适应性等前瞻性的学理观念,这是作为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文化和世界

作者简介: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社会理论等研究;张洁,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跨文化社会研究、传统村落文化保护。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乡村社会重建与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JJD840015)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关怀的是传统文化在面临社会转型、新旧交替之时如何保持自主性,如何从文化主体适应到文化主权回归的过程动力机制。因而,费孝通文化观所渗透的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文献具有研究价值,值得重新阐释。

一、问题的提出:何谓“文化主体”

主体(Subject)是一个与文化权力相关的学术术语,社会学界对此学术概念理解不同。以20世纪80年代分界,80年代以前,社会学家们对“主体”地位的强调日渐缩减,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诺姆·乔姆斯基、米歇尔·福柯等社会学家们都对“主体”产生了批判和质疑;80年代之后,随着人类学的诗学化和政治学化转向,以马·库斯和费舍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开始强调“主体”,“主体”地位再次回归。知识社会学更强调“主体”的“话语”和“权力”。福柯认为,“主体有两层意思:屈从于他人的控制和依赖关系,并通过良心和自知之明依赖他自己的身份”。^[1]阿兰·图海纳将主体定义为“通过个人的自由和经验实现个体或群体作为行动者的建构和改变情境所做的努力”。^[2]可见,“主体”包括了个体及个体意识、文化整体及权力归属等意涵,主体与权力的从属形式和行动者的主观性有关。“文化主体”隐喻了文化的权力归属于谁的问题,是文化的承载者,它可以是文化本身、置身社会文化中的个人和群体,也可以是权力配置的表达方式。综合以上定义,我们认为,“文化主体”就是生活在社会文化之中的有意识的个体或者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可以是社会文化自成其类的社会整体或文化群体,以及在社会文化中文化“权力和话语”的持有者。

费孝通在其一生所亲历社会转型的“三级两跳”^[3]的历程中,对文化如何保持自主性的问题给予关注,并撰文表达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文化面对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忧思和关切。“文化自觉”^[4]的提出强调了文化的“主体性”、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能动作用以及文化主体的权力归属问题,即“文化自主性”。可见,“文化自主性”就是文化的“自我适应”“自我更新”。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上的自觉与更新”,^[5]就是“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6]强调了“文化适应性”;而“文化更新”则是强调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是文化如何在转型中依靠自己的力量“推陈出新”或者“去旧迎新”;而“心态回归”是强调文化的根本在“人心”,人民是文化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人,对于文化保持自主最根本在于文化主体(人)的自主和自觉。费孝通在晚年最重视司马迁那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生哲言,这种境界不仅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人性和社会的觉知,更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心灵”叩问和心态回归。

二、从传统到现代:文化主体的历史适应性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强调了文化主体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适应性”^[7]。费孝通是在“中与西”“体与用”“同化与异化”等二元文化

框架内探讨文化主体性,就是在社会文化转型进程中,文化主体如何进行主动适应与调适,凸显了文化主体的历史适应性。

文化的历史适应首先是“人”的自主适应性,即在“中西”“内外”“新旧”文化变革中探讨“人”之适应性与主动精神。费孝通在其早期学术著作中从未远离过关于“人”在文化之中所发挥作用的探讨,比如《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等都论述了农民如何发挥文化自主性,对文化的积极主动适应。费孝通关于文化自主适应性探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中看到文化主体的适应性;第二,强调机器生产和手工劳动之间如何保持生产劳动的自主适应性。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阐述了“江村”农民如何在外来技术的介入下,积极地适应变革,参与到现代科技生产生活。江村的蚕丝技术“主要来自国外,缫丝工业主要来自日本”^[8]。在第十二章“蚕丝业”中,费孝通阐述了当地官民是如何通过积极的努力参与蚕丝业改革,促进增收。面对现代工业技术对蚕丝业的冲击,各方(政府、合作工厂、江村农民)积极进行控制、参与改革试验,以改变工业化力量所带来的蚕丝业衰落困境。费孝通把“江村”改革的“外力”分为“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9]两种力量,分析了在两种变迁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文化主体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江村”调查反映了中国农民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之时,并没有全盘接受或否定,而是在维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调整和适应。费孝通认为,促进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是“传统力量和外来力量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10],这一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而是“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11]体现了文化主体的自主适应性。

此外,保持文化的“自主适应性”还在“体用”“主客”“精神与物质”“手工劳动与机器生产”二元结构之间进行探讨,此为文化主体的人文劳动的历史适应性。在“江村”研究之后,费孝通对文化碰撞过程中的人文世界和物质世界进行讨论,探讨“人性和机器”,前者代表文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而后者代表着现代科技外力之下的生产方式和现代组织形式,在费孝通看来,机器化生产是“现代文明的病症”^[12]。费孝通认为,机器化大生产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但是面对冲击“切勿盲目模仿”,而是要看“我们自己历史里所滋长出来的传统”,心存侥幸,必然“忽略双方历史背景,画虎成狗”^[13]。《人性与机器》一文表面看来是费孝通对机器大工业文明的冲击所带来的乡村手工业的凋敝现象的一种检视和忧虑,实则暗含了对于文化主体性的强调和探讨,在费孝通看来,文化主体的回归体现在是否“增加人们的幸福生活”,机器化生产“富有积累性和正确性”^[14],但是,人才是文化的主体,人类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役”,那是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反客为主”的病症,这样的现象使得社会文化中的人们丧失自主性。费孝通认为,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结果是“人格的丧失”,带来社会组织生活的“被动和不安”^[15]。面对机器化大生产对于传统手工业带来的冲击,费孝通列出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道德控制力;二是“工农相辅”的乡村工业化

道路。^[16]费孝通提出的“工农相辅”的乡村工业化道路是“中国手工业的前途”所在,因为农民发挥文化主体性、创造性进行生产劳作可以“增加社会机构的幸福感”,弥补机器生产的弊端,这种人和机器的主客关系被费孝通称为“伙伴精神”^[17]。“伙伴精神”最适合弥补机器化大生产的不足,体现着“人们的幸福感的增加”,因为它是“迁就人性的”,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能够建构出和谐的人与物、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文化保持自主适应性所在。

在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注重从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文化转型和文化融合之中寻求对文化主体的关照。文化主体在立足于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的适应性的调试、创造性的转化和对于客观外物的主观能动实践,也是“天人合一”所呈现的自然和个人之间的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通达关系。文化主体性就是统摄天人关系,以人类“幸福感的增加”为终极关怀的社会观念、人生观,只有在整个文化社会之中的主体具有高度的文化意识、文化气节、文化精神的灵魂之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才能够真正实现。

三、从载体到变体:文化主体的循环性

文化具有动态循环性,文化主体也是循环的、变动的。从20世纪40—50年代直到80—90年代,费孝通都在不同时期强调了面对文化的“中西古今”“传统现代”转型与碰撞中如何保持自主性的问题,相继撰文展开讨论。正如李友梅认为,“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老一辈儒家到新一代儒家代表牟宗三、余英时、杜维明无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问题殚精竭虑,学者们终其一生都陷入在中西文化之争中”。^[18]中西文化论争的讨论长盛不衰,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正在加剧,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如何维系?根据费孝通的探讨可知,保持文化自主性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并非是“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而是在维系传统,立足自我的“文化创新”。基于此,笔者认为,文化自主精神的实现是在社会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经过人为创新而实现的,这种创新必然是从作为“文化载体”的凝固态的文化主体转变成为作为动态的、均质流动态的“文化变体”的文化主体,彰显了文化保持自主性的历史循环变迁和主体调适的特征。

费孝通一生都处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之中,他对于文化主体性的理解与自身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休戚相联。20世纪40—50年代,在费孝通《生育制度》等论著中都看到明显的功能主义的学术底色,但是,在其晚年的“补课”和“反思”中,他逐渐意识到这种西方的文化观强调的是“主客分离”“天人分离”的价值观念。先生认为,功能学派依旧是“天人分离”的。^[19]《文化观》的观念就是西方价值“天人分离”观的表现,费孝通认为,人文如果“仅仅看到自然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危险的”^[20],由于对西方“天人分离”文化观的担忧,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正是对于西方文化观念忽略文化主体性的必要补充和纠正。“文革”以后,拨乱反正,他将治学理想和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寻求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城乡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和共通性,打破二元对立的格局,在传统文化之间找到能够彼此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融合的纽带。此外,费孝通在晚年强调对文化主体性的把握,要“先研究人,再研究社会,再研究文化”,因为,文化的问题是在人如何相处中发生的,这正是费孝通晚年对于西方文化忽略“文化主体性”的“物我分离”价值观进行比较反思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文化观念中所强调的“文化主体性”渗透着对于人类美好生活和价值追求的美好愿望。在费孝通的“第二次学术生命”里,他说“我的口袋里只剩十元钱了,不该随意零零星星买些花生米吃,而应当集中起来买一件我心爱的东西才是”^[21]。费孝通在“改正”那年(1980年)已经七十岁了,当时他希望接下来的学术使命和工作重点就是“取得生活上的需要和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形成一套物质设施和社会结构相结合的体系”^[22]。可见,文化自主性体现在精神和物质的丰足和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此外,文化自主性还体现在“人”作为智力资源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智力资源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23]费孝通为知识分子平反、正身,提出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二要诀”^[24],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价值。1983年9月20日,费孝通在江苏省城镇研讨会上做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发言,^[25]将苏南地区的小城镇研究作为探索试点,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小城镇”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出路所在,也是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寻找连接纽带的切入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城镇从衰落、凋敝走向繁荣的原因是因为国家“以粮为纲”政策取消了农业的商品生产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经济性,这才使得小城镇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功能,因此,“重农抑商”是小城镇衰落原因所在;对比之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城镇明显繁荣起来的原因是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和“工农相辅”的模式。费孝通发现,“社队工业”顽强的生命力实则正是源自于滋长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农村原生态的农民生活和习性,正是这种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存在将即将凋敝的企业支撑下来,费孝通将此模式命名为“苏南模式”,“苏南模式”正是一个充分发挥农民主观能动性和展示文化主体性的成功案例。“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充分体现了农民作为历史主体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文化的主人和主体通过内生机制而不仅仅依靠外力去干预的文化自我更新机制,在这里既能够看到费孝通“文化整体观”的学术底色,也能够看到费孝通文化观中强调文化主体具有深厚的历史文脉,奠定了他后期将不断思索如何从“文化到人心”的思考逻辑。

《下好中国人口问题这盘棋》一文论述了解决社会人口问题的策略:一是发展小城镇;二是合理组织人口迁移。在费孝通的长远规划里,人口问题与城乡二元问题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完美嫁接的纽带,通过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实际反映了文化主体通过知识下乡、技术下乡和知识分子下乡等策略维持地方和世界、边疆和内地、城市和乡村之间“断裂与延续”的文化自主性。此外,费孝通强

调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论述体现在他对于民族文化主体的讨论上。在《谈“民族”》一文中,费孝通认为,汉族是融合少数民族为一体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待民族识别工作首先要尊重历史,其次是给予优惠的民族政策,最后要特别慎重”^[26]。在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和情感上,费孝通鼓励少数民族应用自己的语言、鼓励尊重民族人才、保护少数民族博物馆、发挥少数民族的文化优势、呼吁抢救民族地方文物,建设民族博物馆,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维持和保持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尊重和帮助他们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和民族之魂的实践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说草根工业》一文中,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如何走出一条“农村工业化道路”。在费孝通看来,正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自身发挥的作用才“逼”出了工业化,是“草根工业”蓬勃发展的动力所在。乡村文化充分发挥自主性是农民自主发挥创造力自然滋生、油然而生的主动选择。农民是乡村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文化主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践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改善生产生活状况,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提升生活幸福感。“草根”阶层焕发活力,是历史的主人,他们的行动策略体现了文化主体发挥能动性,主动适应文化全球化变迁的过程。此外,费孝通注重少数民族问题,始终把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所激发出来的内在的“内生动力”^[27]作为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并非简单的“西化”“洋化”,而是“自主的现代化”,^[28]是要“自己做主自己来搞的现代化”,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从“民可使由之”的社会变成“民必使知之”的社会。^[29]在这一阶段,费孝通倡导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为主动参与发挥本民族优势;二是积极发展为现代民族。费孝通通过去到甘南藏族等民族地区的考察,发现民族地区可以自行形成根植于本地生态经济的农业系统和商业经济圈,他看到了少数民族人们在本地是如何自发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精神和创新意识,发挥本民族的优势来建设自己的家园文化的“边区开发”的模式。这时期,费孝通对“文化自觉”充分发挥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不仅仅是保守自己的文化和固步自封,而是要积极探索,融入现代文化元素中,从中找到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综上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费孝通强调文化主体的自身的创造力、文化价值和自我调适、自我主动适应现代文化的特点,并试图将文化因素应用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相结合的积极探索和尝试,注重的是“保留”和“发挥”文化主体性,精准定位、识别本民族文化特色,通过农民自身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来寻求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但是,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费孝通又在新一轮的高速发展的文化轨道上与时俱进,他开始质疑“固守”和“复旧”传统文化,认为“维系传统”并非长远之道,文化主体性的发挥需要寻求新的积极力量,这个时期正是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概念的时期。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性的强调朝向了一种“他者化”的转型,即从强调发挥“自我文化”转向了积极地学习借鉴“他者文化”的转向,在“自他”“内外”文化循环中

找到连结纽带,寻求文化主体性。

四、从本土到世界:文化主体的世界性

文化主体性的“他者化”转向首先体现在文化全球化、世界化的视野扩展上,就是指文化主体在面对世界文化的裹挟之下的吸收、借鉴和取舍。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的提出强调了文化主体性的世界关怀。“文化自觉”确立各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性”的把握不仅在传统和现代、本土与外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关系范畴,更为主要的是,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下,在对立之中找到对接,打破“民族和世界”的二元对立框架,使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立足自我,吸收借鉴、站稳脚跟,拥抱世界。“文化自觉”对文化主体提出了新要求,就是全球各族人民、世界各国人们能够保留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以自己的独特身份融入“全球化的大社会”。^[30]因此,“文化自觉”的提出是费孝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外来文化,如何取舍,如何立足自我而又保持自我不被抛弃的一种文化探索。相应地,文化主体从保守自我、找文化特色、发挥自我转向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融入的世界格局之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彼此包容与文化创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全球文化里,造成危险和冲突的并非阶层、贫富或者经济集团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冲突。^[31]对此,费孝通并不认同,他认为,文化所代表的方向应该是“中和位育”而非“霸权”。^[32]“中和位育”强调文化主体在“道德”层面上的发展自我、减少冲突、增进理解、促进交流,通过自身的文化气质、精神风貌和正气绽放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强调了中华民族文化如何在世界之中强调和维系“民族文化主体”。

文化主体首先是“己文化”的主人,是本民族文化的根脉与灵魂。费孝通认为“异文化”有两种:一种是国外文化;一种是世界各族民族文化。^[33]正确处理“异文化”的文化主体有助于确立本民族、本土文化的文化主体。20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考察了中国东北和西北几个人口在十万以下的小民族,开始意识到除了国外民族以外,还有除了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如何保持文化自主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其深层含义不仅是我国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全球各族的文化主体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费孝通在思考“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后,真正触发他开始思考本土文化如何不被全球化浪潮的全球文化“淹没”的问题源于上海浦东问题,由于浦东新区开发,中国政府直接引入了全球跨国企业进驻上海浦东新区,一夜之间,作为文化主体的农民失去了土地。^[34]农民和土地是不可分离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不仅仅意味着丧失了文化土壤,也丧失了生存之本,上海浦东农民却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丧失了“土地”,这是对本土文化的强烈冲击,费孝通被深深地震撼了,他深刻地意识到当前最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面前不被文化所淹没,不被吞噬、不被瓦解,

唯一的策略就是学习、吸收、借鉴。作为对于经济全球化所作出的积极应对，“文化自觉”提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就是在面对全球化、世界文化的全球格局中，本民族的“己文化”应该如何摆正心态、确立位置、适应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应有之义。费孝通认为，“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35]在整个90年代的全球化大背景中，费孝通思考的是，如何从维持传统到吸收借鉴的转型中来，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主体性。这种保守不是以“固守陈规”为基础的文化适应，而是以“吸收借鉴”为原则的文化融合，建立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持文化的生命力，这个抉择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自主选择，也是对于文化生命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呼唤。基于此，费孝通已经看到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一味排斥，并不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赢家，而是要积极吸收学习借鉴，融入“全球化大社会”，变被动为主动，变固步自封为积极参与，避免本民族文化被世界巨浪所淹没，此为文化主体性的“他者化”转型的世界关怀和全球眼光。

五、从生态到心态：文化主体的心性

费孝通一生的理想是“志在富民”，“富民”问题实则是“生态”问题。如何让中国农民“富起来”是费孝通所关怀的核心问题，强调“百姓之利”而非“君子之义”，即为全民利益谋福祉。费孝通文化观中关于文化主体的“心性”层面的探讨要追溯其学术背景、时代际遇和世界形势。

首先，从出生背景看知识分子的“心态”问题。费孝通虽然一生在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农民问题，但自己却是在小城市长大的，费孝通于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城一个小士绅的家庭，这恰说明了中国乡村研究之于他是自己作为“最后的绅士”^[36]进入到与自己成长环境的小城市迥然不同的乡村的“初探”，这种“城乡跨越”也是他对于中国乡村农民生活在“心态”层次上的初步探索。

其次，从学术经历看费孝通的“心态”文化观，费孝通青年时代是在清华大学跟随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并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在其《乡土中国》论著中就渗透出他早年社会思想的“心态”层次，正如杨清媚认为，“‘乡土中国’不过是费孝通作为最后绅士的心态的写照”，^[37]并提出了“心史”的概念。比如《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理论，实际上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儒家“内圣外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有相通之处。“差序格局”是由内而外、由此及彼的“推己及人”，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以己为中心，不断“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向外推远的。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性、修身性，从早期《乡土中国》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古代思想启蒙到晚年提出了“新差序格局”来重建世界秩序图景的理论灵感启迪，无一不贯穿到儒家文化精神对于费孝通的学术理论和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也是最终提出“文化自觉”，倡导发挥文化主体性在“心态层次”的核心来源。费孝通认为，正是儒家传统的伦理原则，中国传统思想对

于“我”的关注,自然就继续向“内”方向的自省,也就引出比“我”更接近“内”的概念——“心”的范畴。从早年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到后期的研究论著,从“乡土中国”到“志在富民”,从“天下大同”到“文化自觉”等理论的提出都渐渐渗透出费孝通在从生态问题到心态问题的理论转型,比如晚年提出了“全球化大社会”^[38]、“全球世界”等概念,这些观点都可以诠释为从“富民”到“秩序建构”、从“先富民”到“讲道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态到心态的文化主体性的转换。在《个人·群体·社会》一文中,费先生曾回顾了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潘光旦等人的学术思想,开始反思中国社会文化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他更加关注的就是文化的人文性,指向人的“心态层次”。费孝通在晚年的补课过程中聚焦到文化的互动层次,文化已经并非是“文野之别”的、单向度的文化,而是在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相互交融、碰撞之中的自我反思、自我检视而形成的文化,这个过程实则就是“文化自觉”所强调的对己文化有“自知之明”。

再次,从时代际遇来看费孝通的“心态”意识。追溯其早期文化观论述,费孝通的“心态”意识的觉知来自于两种领悟:一个是自己师从于史禄国研究 ethnos 概念的影响,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研究族团及族团间关系就应用了史禄国教授的“向心动向”和“离心动向”概念来说明了汉族对瑶族带来的两种变化,隐喻了民族之间分分合合的民族变迁历程,这种“分合相继”过程实则是民族凝聚力的问题,也是人心问题,这个概念框架叫做“ethnos”,这一框架构成了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基石和理论灵感;第二种领悟是晚年费孝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儒家精神理论的回归和认同,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是从“人心”层次上看待世界秩序问题和道义问题的。这种心态的回归是从他参观孔庙后获得灵感的,在《孔林片思》一文中,费孝通深刻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将孔子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处世之道和伦理原则“移花接木”地应用到处理民族问题和文化主体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假如孔子身处的时代是“战国时代”,那么今天的世界则是“全球性的战国时代”^[39],如此推理,中华民族的主体不仅仅有国别之别,也有“地球村”的“村籍”籍贯之别和“身份认同”差异,此时,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主体隐喻为新的“孔子”,“新孔子”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费老认为,“新的孔子必须不仅是懂得本民族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的关系”。^[40]由此观之,文化主体从简单的人际关系到家族关系再到国家关系逐渐扩大维系全球文明的秩序甚至是信仰归属问题,这即是文化主体的“心性”特征。只有站在心态层次处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国家关系,才是真正的实现“文化自觉”。

此外,文化主体的“心性”还体现在主体“间性”问题,即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的秩序、共存和相处问题。费孝通从关注生态问题转向心态层次,最重要的是关注到文化主体的道义、秩序、荣辱、相处、共存等问题。世纪之交,全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全球化建立

了一个“地球村”绑定了人与人的经济但却割裂了人与人的情感和秩序,面对复杂局面,费孝通开始担忧了,他说“没有比当前世界更需要一个道义的新秩序了”^[41]。费孝通开始思索的是人民“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举例说明,1993年,费孝通在一次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座谈会上再次对自己早期的学术进行反思,说自己过去关心“丰衣足食”而忽略了“荣辱”和“道义”问题。费孝通反思道,“我不得不想到我的启蒙老师派克教授早就指出的人同人集体生活的两个层次,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我拾了基层,丢了上层,这是不可原谅的”。^[42]由此观之,费孝通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强调文化主体从“生态”到“心态”,从“富民”到“立德”,从关注“物质基础”到“上层建筑”上来,注重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中重建道义秩序和伦理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不仅仅是物质的世界,还是一个人文的、社会的、道义的世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和位育”“中庸之道”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原则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同样适用于从“心态”层次处理民族的、世界的、国家关系与世界秩序问题,这也是强调建立世界“地球村”的“村规民约”来建立一个“文化自觉”的、精神的、道德的世界图景。

六、结论:复合循环文化主体

文化主体性彰显“复合性”和“循环性”。“复合”是因为文化是复数的,而非单数的,文化主体也是多元、复合的“整体”,而非单向度的、孤立的“个体”,是面向“世界的”,而非固守“地方的”;“循环”指文化是历史的、循环的,“文化主体”也是循环的、历史的、经时间沉淀而形成的历史的主人和主体,文化主体是在对话商榷的动态流动中形成的,这种既是“复合多元体”又是“历史循环体”的文化主体称之为“复合循环文化主体”。文化主体是循环的、互构的。“文化主体”是在与时间、与他者的互动中滋长出来的,文化保持自主性并非是专断自我的,而是与他者实践不断商榷的结果。费孝通对“文化主体”的探讨可从“时间”和“他者”纵横两个维度进行研究:横向维度是从《乡土中国》《江村经济》来剖析中国乡土社会的“自我”和“邻里”的关系,纵向的维度就是体现在《云南三村》关于中国农业、手工业、工业社会历时发展变革中的时间“继替”“承前启后”的关系,即传统文化如何发挥文化自主性吸收并借鉴外来文化的探讨;到了费孝通晚年的时代,他又置身于21世纪的“全球化的战国时代”^[43],回归到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理论的探讨,从自身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上审视传统文化如何发挥文化自主性。从“天下大同”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探讨贯穿于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之中。值得强调的是,费孝通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探讨强调文化的“主权”问题,费孝通寻求文化的主体性其实是寻求“谁是文化权力的主人”问题,把文化的权力还给谁?这是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费孝通其实是“构成主义者”而非“静态主义者”,他始终从动态的、历史的眼光来看文化权力的归属问题。文化的权力在时空与他者的碰撞中不断被争夺,文化主体归根结底是“文化主权”问题。权力在农民手里,农民发挥文化自

主性;权力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充分发挥民族特色,发展民族文化;权力在民间艺人、手工业者手里,民间艺人和手工业者充分发挥草根阶层的民间智慧和创造力;权力在国家权力意志里,国家调控、政府主导、政策执行,国家发挥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效力使其保持自主性;权力在人心,文化持有者充分激活自己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进行文化的创造转化,保持自己对于自身文化的主要话语权和支配力量,对外在影响和破坏文化主体的因素形成免疫,此为文化在“人心”层次的自主。

综上所述,文化主体性实际是一种“循环复合主体”。文化主体在面对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自我/他者、弃旧/扬新、变动/保持、心态/生态等可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所强调的文化的自主、适应、嬗变。“文化主体”的适应和嬗变是民族文化只有保留自主的、主动的文化权力,充分发挥本土民族的文化优势和文化特点,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取舍、文化融合过程中不至于被吞噬或丧失,不被抛弃就能“紧紧抓牢”文化的主权。与此同时,费孝通在寻求文化发挥自主性、创造性人文世界的过程中也遇到现实困境,这些困境不仅是费孝通值得思索的现实问题,也是留给后辈值得青年学者们思索的使命和职责。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在研究“文化自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对于我们处理社会问题、人际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都依然有重大学术价值。今天的人们是处在一个“后文化自觉”^[44]的时代,文化主体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过度的物化和分离,人们对于物质的过度依赖导致分离,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世界和伦理秩序建构上的错位,真实变成虚幻。正如费孝通所预测的,人们逐渐从“我”向“心”往里看的同时,产生了另外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有“虚假”“包装”“自我的蒙昧”“物质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依然是后文化自觉时代带来的问题,文化主体应真正做到文化的自主性呼唤一种人文的、美好的、道德的、精神的、“在一起”时代的到来。

注释:

[1][法]福柯:《主体与权力》,载休伯特·德雷福斯、保罗·拉比诺主编:《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钱俊译,台北,桂冠出版社,2005年。

[2][法]阿兰·图海纳:《民主是什么?》,法雅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3]“三级两跳”的“三级”是指农民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两跳”的第一跳是中国从传统乡土社会开始跳转到工业化社会,第二跳是当代中国从工业化社会跳转到信息社会。费孝通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比作“三级两跳”。参见费孝通:《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4]“文化自觉”的概念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参见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

[6]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7][20][35]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8][10][1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78、20、21页。

[9]其中促使变革的力量是“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江苏省女子蚕业的工业变革力量”,承受变革的力量就是普通农民、当地领导人、传统技术和地方政府。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1页。

[12][13][14][15]费孝通:《人性与机器》,《费孝通全集》(第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1-52、47、49、51-52页。

[16]以中国新工业吸收农村人口,使农民可以专靠农业谋生,工业可以从农村里抽出来,加以机器化,达到现代水准。参见费孝通:《人性与机器》,《费孝通全集》(第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17]“手工业中人和机器的关系是:人是主,工具是客。人和工具之间充满‘伙伴精神’”,手工业可以发挥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表演性和人格性,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手艺,表现着他的人格……人在物里完成他的生活”。费孝通:《人性与机器》,《费孝通全集》(第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18]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19]“马林诺夫斯基将人看成是自然的产物,人这个自然的产物通过对其他自然产物的加工,制造成了一个人文世界。这个加工过的世界虽然和原来未加工过的自然面貌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参见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21][2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第286、286页。

[23][2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1、12页。

[24]“信任、待遇、安排、使用、培养、提高”,参见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2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27]“内生动力”这个概念是指文化持有者主动地、积极地、创造地进行生产和创造的内在力量和积极行动的主观诉求。这便是充分发挥文化主体所要激发的内在力量,由内而外地影响外部社会的力量。

[28][29]费孝通:《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一些体会》,《费孝通文集》(第七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8-47、38-47页。

[30]费孝通:《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3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6页。

[32]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33][34]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9、99页。

[36][37]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42-156、142-156页。

[38]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提出了“全球性大社会”概念来说明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世界和地方的全球化趋势,认为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参见费孝通:《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39][40][43]费孝通:《孔林片思》,《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44、39-44、39-44页。

[41][42]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第18、18页。

[44]赵旭东:《文化自觉之后的觉醒——费先生十年祭》,《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